

张士杰生平及其写作生涯

史同文 飞雁

龙河少年

张士杰 1931 年 12 月 9 日出生于河北省安次县（今廊坊市 董常甫村。安次地处京津之间 中部有永定河 北部有龙河 京津铁路从境内穿过。历史上 安次县地处幽燕 自古幽燕多慷慨悲歌之士。县内南桑园和北桑园之间至今犹存晋代名将和著名诗人刘琨的坟墓；县城南部传说是当年杨六郎大战韩昌的旧战场；明代燕王扫北时曾在龙河两岸流传下了佳话 延续到近代 在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中 义和团、红灯照在廊坊车站大战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的联军，震惊了中外。这些古今的传说，使得安次县成为一个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地方。

董常甫村座落在龙河边上。过去，村里的乡亲主要靠种地为生。张士杰的祖父张泽桓是位中医，他医术高超，人缘又好，在方圆几十里很有些名气。张士杰的父亲名叫张广聚，弟兄四人，老医生张泽桓把一生的医术都传给了长子广智和次子广聚。后来广聚继承父业 在乡行医。

张士杰弟兄三人 他排行老大 小时候父亲开药铺 家里还兼营客店。士杰的童年是在小药铺和客店里度过的。这两个地方每天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使他从小就听到许多故事和笑话。

童年时代的张士杰，听民间故事除在小药铺和客店外，

还有三处：一是本村的耀爷家；二是本村的老民间艺人董万海家；三是本县西储村姥姥家。

耀爷名叫董耀，当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是董常甫的穷大辈儿，当了一辈子长工。老人家喜欢孩子，张士杰从小长在他家里，经常缠着他给讲故事听。士杰最早整理发表的几篇义和团故事如《红缨大刀》、《张头和李头》、《宗老路》等都是从耀爷那里听来的。

老艺人董万海也是个大辈儿，张士杰管他叫万爷。万爷的竹板书说得好，清脆火爆的竹板一打起来，一张嘴能夺半台戏。张士杰听万爷说《杨家将》、《义和团战落堡》一听就是大半夜，越听越爱听，简直听得入了迷。

当年，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中，董常甫的义和团也是十分红火的。张绍桓、张义桓、张林桓、董耀都是当年的义和团团民。张绍桓包打西什库，在廊坊一代传为佳话。张林桓是个老艺人，他在义和团作战时，吹奏乐曲，用以鼓舞伙伴们的斗志，去狠狠打击侵略者。董常甫的义和团好汉们，在董常甫村边挖下了战壕，对抗洋毛子，使敌人闻风丧胆。有一次，驻在廊坊的日本兵化装成义和团，腰里掖着手枪，朝董常甫村跑去，后边有一队日本兵紧紧追赶，董常甫的义和团在战壕里看到有“义和团”打了败仗朝这边跑来，赶紧跳出战壕前去接应。哪想到，伪装的义和团从腰里掏出手枪，朝着董常甫的义和团开枪了，后边的日本兵也朝董常甫的义和团开了枪。这时候义和团的英雄团民一个个倒了下去，鲜血染红了龙河边上的土地……少年时代的张士杰，听到这里是多么地痛心啊。

张士杰的童年有一段时间是在姥姥家度过的。他的姥

姥白老奶奶是一位柳编能手，并且善于讲故事，张士杰后来整理的第一批传统民间故事《龙河》、《西瓜女》、《灵子和傻子》与义和团故事《白母鸡》、《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等都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张士杰的舅舅白宝山是当地有名的民间艺人，他爱好民间器乐，笛、箫、笙、琴、锣、鼓样样能拿得起，最拿手的是吹大管。当年义和团运动正红火的时候，安次县军芦村的义和团大师兄冯兆来带领军芦村和南储村的二十多名艺人组成了义和团乐队，他们用管、笙、笛、云锣、大鼓等乐器演奏，配合义和团将士上法、操练、出战、庆功、夜战、哀悼等各种活动。他们这支乐队曾多次参加战斗，还参加过著名的廊坊大战，鼓舞、激励着义和团的将士奋勇杀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这些乐曲一直流传下来。白宝山经常为张士杰吹奏这些乐曲。张士杰从那气势雄伟、优美动人的《巧跳神》、《倒提金灯》等乐曲中，像是看到了义和团将士排刀上法的威武阵势和红灯照提灯夜战的动人形象。在舅父的影响下，他从小也爱上了音乐，特别喜欢民间器乐，当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在龙河滩打草拾柴的时候，经常是讲完一段“拿大刀杀洋毛子”的故事后，嘴里就含着苇笛儿和草笛儿吹出一支支欢快的乐曲来。

1939年，九岁的张士杰进了董常甫小学读书，当时学校的教师有鲁村树和高焕章。当他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囫囵吞枣地看起《西游记》、《水浒传》来了。他的父亲张广聚爱读书，家里藏书很多，有买的、有借的、也有别人赠送的，这一本本小说，为他展现了一个神奇的新天地，他看了一本又一本，看了一本给小伙伴们讲一本，这就使士杰自小养成爱读书、会讲书的习惯。

1943年，张士杰初级小学毕业后，因家庭生活困难失学了，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开始在龙河边种庄稼。他和乡亲们一样，辛勤耕耘，盼庄稼长得苗旺棵壮，秋后有个好年景。可是，张士杰还有自己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乡村教师。他觉得乡村教师在乡亲们眼里是“圣人”是受人尊敬的先生。

张士杰在家务农的日子里，和乡亲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和老艺人张林桓是形影不离，张林桓常教他唱京剧，拉胡琴。每逢春节到来，张士杰是董常甫村闹花会的活跃分子之一。小车会上他负责伴奏。正月十五过灯节的时候，张士杰总要精心地做盏漂漂亮亮的大灯笼挂到街上去，当正月十五夜里要放焰火了，张士杰把早在春节前准备好的一垛柴禾抱到大街上，点燃起来。红红的火苗越烧越旺，映红了天地，也映红了张士杰那张欢乐的笑脸儿。

1947年，张士杰考进了廊坊中心高小。在高小读书时，他有三门功课学得最好，一是语文、二是地理、三是历史。他的作文写得好，老师每次都把他的文章当做范文当众宣读。上历史课、地理课的时候，他越听越入迷，他心里想：中国的土地有这么广大，中国的历史有这么悠久，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值得自豪啊！他曾在一大张白纸上仿照课本上的地图画了一张红红绿绿的中国大地图，全班同学都夸他画得好，画得象！

1948年春天，麦苗儿刚刚返青，张士杰和张士清几个伙伴去廊坊上学回来，在南门外看到一个国民党士兵在麦苗垄里放战马，张士杰一见战马正啃着青青的麦苗儿，好心疼啊！他痛斥国民党士兵：“难道说你的父母就不是庄稼人吗？麦子已返青了，你还在这儿放战马，这不是活活要庄稼人的命

吗？”士兵一听，立刻火冒三丈，凶神似地追了上来。张士杰和几个伙伴连忙逃跑，一口气跑回了董常甫村。

张士杰上高小的时候，迷上了吹口琴，他好不容易攒钱买了一支亮铮铮的口琴，可是一吹起来不成个调儿，同学们说他这不是吹口琴，是宰鸡。张士杰火了，带着口琴回到家里，坐在房后的壕沟里吹起来，整整吹了一夜，磨得嘴上起了血泡。第二天，他又带着口琴来到学校里，课间休息时又吹起来，一夜之间，他琴声竟然变得悦耳动听了，同学们是多么惊奇啊！

1949年，19岁的张士杰考入了廊坊简易师范学校。那时节，廊坊刚刚解放，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窝头咸菜，连开水都喝不上。尽管如此，上了师范的张士杰还是热情高涨，意气昂扬。上课时，他认真听讲，认真记录，一下课，就一头扎进那小小的图书馆里，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 鲁迅的《阿 Q 正传》、茅盾的《子夜》、《腐蚀》、巴金的《家》《春》《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张士杰读完一本又一本，天天读到深夜，熄灯钟响了，他就悄悄点上自己买来的蜡烛，用书本档住光亮 偷偷地读。

张士杰热爱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他的教育极深。鲁迅先生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深刻地揭露了吃人的旧社会，使张士杰认清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从此，他也更加热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

张士杰的作文写得好，字写得也好，被同学们推选为墙报委员。他把黑板报办得生动活泼，文图并茂，同学们都说

他的稿子写得有大学中文系的水平，给他起个外号叫“中文系”。

在师范学校里 张士杰除了热爱文学外 还喜欢音乐 他会吹口琴和拉胡琴。学校组织师生演出新歌剧《白毛女》、《王秀鸾》、《赤叶河》时 张士杰是一位热心的伴奏者。

乡村教师

1951 年底 张士杰从廊坊简师毕业 第二年春天 被分配到安次县熊营村小学教书。这是个离铁路不远的小乡村，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实行复式教学。在一个教室里，教四个年级的学生。给四年级讲完给三年级讲，然后是二年级和一年级。备课时他一个人要备四个年级的八门课，外加美术、音乐和体育 等学生们放学回家了 还要赶紧点火做饭 尽管一天忙得要死 但他精力旺盛 对工作一丝不苟。书讲得好，作业判得认真 学生进步快 全区统考时 熊营村小学成绩优良 他被评为优秀教师 得了奖状。

1952 年秋天，张士杰被调到安次县东张务中心小学教书 担任五六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和历史 教学任务更繁重了，可是这个年轻教师工作热情非常高涨，他除了认真教课外，为了充实教学内容，开始在课堂上给同学们讲安次、武清一带义和团的斗争历史 讲《红缨大刀》、《马六刀劈二毛子》、《安次县为什么是土城》等故事 因为充实了这些内容 他的语文课和历史课都讲得非常精彩，很受学生的欢迎。这情况学校领导知道后非常高兴，支持他这样讲下去。领导的表扬和鼓励，使张士杰的劲头更足了，他利用假期时间，深入农村 向农民访问、调查 搜集义和团的史料、歌谣和故事 他先

后走访过安次县肖辛庄的老义和团民王老刚，大王务 81 岁的老人贾玉福等，这些老人，有的背诵气势雄壮的义和团歌谣，有的讲述了激动人心的义和团故事，张士杰含着热泪听，含着热泪记，记了满满几个笔记本。当时张士杰搜集这些资料，完全是从搞好教学出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资料后来竟成为他整理义和团故事的宝贵素材。

张士杰除了讲好课，搜集义和团故事和史料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麦子秀穗的时候》，这是一部反映乡村教师生活的小说，每天当他批改完一迭迭作文本和作业本后，夜已经很深了。他点起了自己的纸烟，在灯下挥笔疾书，但是，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没有成功，后来稿子被出版社退回来了。

1954 年夏天，24 岁的张士杰被调到安次县淘河村完小教书。在他任课班上有个 18 岁的女学生叫张瑞祥，她学习刻苦，作文写得很好，他们相爱了，于 1955 年结了婚。

文苑新秀

1956 年，张士杰得了矽肺病，发烧、咳嗽、气喘、盗汗，病势越来越重，后来终于不能坚持工作了，领导上让他去霸县胜芳镇疗养院疗养。胜芳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小镇，靠近东淀大洼和中亭河，由东淀可以坐船到达天津杨柳青。在胜芳，有青青的芦苇荡，有风景秀美的荷花淀，美好的小镇风情使张士杰想起了龙河，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些美好的故事。于是，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尽管第一部长篇小说没有成功，可是创作的火花在他的心里并没有熄灭。他就在胜芳疗养院的病床上进行写作。一动笔，他的一颗心又回到了龙

河，龙河的风光、龙河的乡亲，一个个都跑到他的笔下来了，张士杰把他们写活了！张士杰把整理好的故事抄写得清清楚楚 投寄到一些报刊编辑部。

象许多初学写作者常有的遭遇一样，张士杰最初的创作尝试得到的也是一次又一次的退稿。可是，面对着一封封退稿信 张士杰一不泄气 二不退阵 他对自己整理的这些民间故事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坚信，这些经过劳动人民口头千锤百炼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的珍品，迟早会出土闪光的！因此，他每次接到退稿后，有的立刻换个信封另投寄到别处去，有的则认真加以修改 进一步提高稿件质量。

命运的吉星终于照到了张士杰的头上。1957年12月，张士杰整理的第一组故事在《民间文学》十二期上发表了。这组民间故事共有七篇：《灶王爷》、《通天塔》、《无梁寺》、《金沙滩》、《逆水行船》、《烧画》、《蜡八粥》。这些民间故事 以生动的情节 风趣 朴实的语言特色受到读者的好评。

稿子刊出后，给了张士杰巨大的鼓舞，紧接着他把整理的几十篇民间故事编为《龙河故事集》投寄到河北人民出版社。

当时，河北人民出版社在保定，负责审阅民间故事的文艺编辑室副主任宋孟寅，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六万字的故事集 心中非常兴奋。他觉得 张士杰搜集的这些故事 富有乡土气息，语言生动朴实，在故事整理过程中所进行的剪裁和加工，都充分表现了这位作者的文学造诣。宋孟寅同志当即与总编辑杨烈商定决定采用这部稿子，并请他到出版社来修改自己的作品。

张士杰穿着他的粗布衣服，带着龙河边的一身风沙，走

进了河北人民出版社，宋孟寅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宋孟寅没有让他立即动手修改稿子，而是先让他学习有关民间文学的理论 并同他一起研究了 A.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序言，经过学习，张士杰提高了对民间文学的认识，然后动手修改《龙河故事集》。张士杰改完作品回村后，又很快整理出了一部一万七千字的童话传说《西瓜女》（内有《西瓜女》、《喇叭花》等三篇民间故事）寄到了河北人民出版社 宋孟寅同志读了《西瓜女》以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即给张士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赞扬这篇童话故事“简直可以与安徒生媲美。”由于出版社领导的重视，结果这个集子提前于 1958 年 2 月出书。同年 5 月，《龙河故事集》也相继出版 这个集子共四万五千字 收进《龙河》、《两棵神高粱》等十四篇故事。这是张士杰早期搜集整理的家乡民间故事，它代表了张士杰早期写作的思想和风格，当时河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同志，曾高兴地把发现张士杰这个农村作者称之为：“泥土中的钻石、沙砾中的明珠。”

海底捞珠

张士杰为了抢救民间文学遗产，为了找到那些闪闪发光的民间文学珍品，他象在大海里捞珍珠一样，敢于深入到大海的最深处。

有一次 他到安次县旧州村去 找一位讲故事能手 去的时候穿得整整齐齐，还借了一辆亮铮铮的自行车。可是到了旧州后，那位讲故事能手一见张士杰是位教书先生，来了个敬而远之，说他自己根本不会讲故事，客客气气地把张士杰给打发走了。过了不久，张士杰去廊坊镇赶集的时候，半路

上又碰上了这位老大伯，老大伯带着几个猪崽去赶集，猪崽从篓子里跑出来了，张士杰赶忙帮他逮猪崽，弄了两手泥土，最后又帮他把猪崽弄到了集上。这一来，老大伯和张士杰亲热起来了，见了面无话不说，有一次，张士杰找他搜集故事，老人家还留住了一夜，给他讲了好几个精彩的故事。

还有一次，张士杰到凤河边上的渔民中间去搜集故事，当地群众向他介绍了一位名叫王文有的老渔民，说这位老渔民知道的事情可多啦！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张士杰想找王文有搜集故事。于是在王文有捕鱼逮蟹的时候，他总去看，有时候问长问短，王文有因为和张士杰不熟识，只是一哼一哈的，话不多。后来他知道张士杰是个教书的，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张先生”，恭敬是恭敬，可就是不肯说心里话。张士杰去了几次没有半丁点收获，听不到故事，他当然不会罢休的。有一回，老渔民王文有撑船靠岸，张士杰跑过去帮他拉船，等把船拉得靠了岸，因为用力过猛，溅了张士杰一裤子泥水，王文有非常过意不去，张士杰再三解释说没什么，王文有才安定下来。经过这件事以后，王文有一见张士杰总是笑着打招呼，话也多了，称呼也改了，管他叫张同志。后来，张士杰每逢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帮着干一些零活儿，这样他们更熟了，说起话来无拘无束，称呼又改了，王文有管张士杰叫老张。再后来，王文有一见了张士杰，话总是说起来没个完，而且谈得自然、生动、活泼。张士杰向王文有请教什么，王文有都象先生给学生讲课似的，讲得又详细又生动，总是怕他听不懂，举一个例子又一个例子。有时候，王文有划着船带张士杰到河淀中去，热心地教张士杰撑船，教张士杰捕鱼采菱，教张士杰怎样战胜风浪。张士杰在王文有的眼里，由张

先生变成了小学生，张士杰感到很高兴，很幸福。两个人越来越亲，王文有明知道张士杰是个教书先生，偏给他讲旧社会讽刺教书先生的笑话，讲完了两个人一起在船上哈哈大笑。俩人在思想感情上真正打成了一片。在这个基础上，王文有向张士杰讲述了当地义和团的斗争历史，介绍了渔民生活，水上知识，当地风俗人情，同时也讲了好多生动活泼的故事，使张士杰学到了好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热情、正直、乐观的精神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很大。后来张士杰写的《刘黑塔》、《凤河湾》、《渔童》等故事，都是从这位老渔民嘴里得来的。

张士杰搜集到一个故事，他不是马上就动手整理，而是千方百计地去了解这个故事的不同的说法，把不同的说法汇集起来进行比较、分析，然后才加工成一个生动的故事。例如，《渔童》这个故事他就搜集到了三种不同说法，其中有一种传说是韩村王宝田老人讲给他的，那是在安次县西储村学校教书的时候，他和刘崇丰在一起，三次访问王宝田，回来后，他经过仔细琢磨，准备动手整理这个故事了。这天夜里，他和刘崇丰钻进被窝，还在一心想着他的《渔童》，想着想着，就突然坐了起来，叫起刘崇丰：“崇丰，昨天王大伯讲的那个渔童，说渔童能活，能长大，还能唱歌儿，他唱的是什么歌儿呀？”刘崇丰翻了大半天采访本，也没找出渔童唱的是什么歌词来，张士杰说：“咱们现在问问去行吗？”刘崇丰说：“问也是白问！光这个故事咱们找他三次了，他哪次也没有说出歌词来！再说这更深半夜的，人家早睡觉了，你在胜芳时，王文有不是也说过这么个故事吗？你再查查他是怎么说的！”张士杰说：“我查过了，也是没有！”在张士杰的催促下，第二天，刘崇丰

又领着张士杰去找王宝田老人，要求他再回忆一下，渔童到底唱了什么歌儿，结果老人抓了半天后脑勺，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

为了这个细节问题，张士杰折腾了好几天，他翻来复去地琢磨。最后在《渔童》里补充了几句歌谣，让渔童在故事里连动带唱活起来了。刘崇丰笑着说：“你早要这样做，何必让我陪你跑这么多的冤枉腿呀？”张士杰认真地说：“搞民间文学，怕麻烦还行？怕跑腿更不行！我的故事都是跑出来的，整天坐在屋子里，哪来的故事呀？”

大放异彩

此后，张士杰紧接着又整理了一批义和团故事。他在整理这批故事的时候，热泪伴着墨水流，泪水常常打湿了稿纸。有时他激动得实在写不下去了，只好停下笔来等感情平静以后再写。他常常告诫自己：“这些英雄人物、这些英雄的故事，只能写好，不能写坏。”一篇故事写成后，他常常拿到街头、地头念给乡亲们听，请乡亲们提意见。然后进行修改，就这样，他一连整理了《高大汉》、《托塔李天王》、《大师兄闹衙门》等十多篇故事。

义和团故事的问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张士杰曾把其中一些篇章投寄给一些报刊编辑部。结果都未刊用退了稿。后来他从中选出十篇寄到《民间文学》编辑部。编辑部同志传阅后，认为这是一组十分难得的民间故事，是珍贵的民间文学遗产。编辑部领导也是很重视，很快给张士杰写了信，通知他这组义和团故事准备采用。并询问他还有多少义和团故事，请他全部挂号寄来，以便统一安排。随后，又给他寄

来了精致的稿件邮箱。编辑部热情的来信，使张士杰受到很大鼓舞。他立即把整理好的义和团故事全部挂号寄给了《民间文学》编辑部。

《民间文学》从1958年4月开始，连续以显著位置来发表张士杰的义和团故事。四月号一期就发表了《红缨大刀》、《托塔李天王》、《铁金钢》、《宗老路》、《渔童》等十一篇。同期上还发表了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作家江曾祺的评论。顾颉刚评论说：“这些故事叙述的很真切动人。借此可知人民群众对于皇帝、官吏等统治阶级的如何不满。帝国主义如何欺压中国，激起人民的义愤，要用大刀来对付枪炮。反动统治者又如何向帝国主义献媚，不顾人民反抗，一味求和保持残局。这是真正的人民的历史。”江曾祺评论说：“义和团传统故事是真实的人民的历史”。“这些故事正是觉醒人民的意识形态，这正是反帝运动高潮中的产物，这里所反映的人民的仇恨更为炽烈。”“人民吸收了传统的形象的特征，传统的结构故事的方法和语言，但却赋予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而且使思想内容达到了可惊的统一。”

紧接着，《民间文学》在第七期、第十期、第十一期、十二期连续发表了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这就如同平地一声雷，张士杰的名字震动了文坛。随后百花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接连出版了《托塔李天王》、《张绍恒包打西什库》、《红缨大刀》等几本义和团故事集。这些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时间，千百位读者的热情来信，编辑部一封封热切的催稿信和电报，纷纷飞向张士杰的土炕头。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为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召开座谈

会 我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著名作家邵荃麟、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晗、民间文学家贾芝、戏剧家陈白尘、文学评论家朱寨、教授赵景深等都为这些义和团故事写了评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张文同志更是几次亲自来到董常甫村，对张士杰进行专访并写出了专题论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张士杰整理的民间故事摄制了动画片《渔童》、《人参娃娃》。此外 这些义和团故事还被译成几国文字 引起了国外民间文学界的注目。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也对外介绍了这位民间文学作家，并刊登了他的照片。

1959 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河北分会发起搜集整理义和团史料和故事的群众活动。张士杰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张文同志，民究会河北分会的刘艺亭、叶蓬和张诚同志，一起编选了《义和团的意志永不灭》故事集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9 年，张士杰加入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并当选为理事 同年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也当选为理事。

在这同时，张士杰还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委员，天津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 年，张士杰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三次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当时周总理正要出国访问，他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在翠明庄接见了十七位出席会议的代表，其中就有张士杰。当时张士杰同志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他眼含热泪 紧紧握着周总理的手自我介绍：“我叫张士杰 河北省安次县人。”周总理微笑着点点头：“啊 你是写义和团故事的，你的贡献很大，以后要继续努力啊！”张士杰激动地连连点

头。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鼓励，使他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

1963年，张士杰被选为安次县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县人委委员 并被聘为安次县第二届、第三届政协委员。

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在民间文学界曾展开一场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大讨论。其中涉及到张士杰，有人对他的义和团故事是整理还是再创作产生了疑问。为此，张士杰先后在《民间文学》、《民间文学集刊》上发表了《我的体会和认识》、《我对搜集整理问题的看法》、《搜集整理民间故事的一些体会》等文章。谈了自己在搜集整理义和团传说故事中的一些做法和遵循的原则，归纳起来，他在整理加工民间故事中的做法大致有六种：（一）突出了人物性格和主题思想。（二）情节的前后调动。（三）故事首尾加工必要的情况说明和介绍。（四）填补漏洞。（五）取长补短。（六）在语言上加以提炼，加上注解。他在整理中遵循的原则是：不改变原故事的主题思想；不改变原故事的基本情节；不失去原故事的风格和地方色彩；尽力保持故事的语言特点；不能以个人的爱好任意取舍，要根据原故事的特点慎重地进行整理。张士杰还公布了一部分原始记录，为这次学术讨论提供了研究资料。

张士杰于 1958 年因病辞职 到 1962 年他虽然卧病在床，但由于革命责任心的促使，仍念念不忘民间文学工作。当时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民间文学》编辑部派专人来村具体协助，由张士杰口述，别人代笔记录，整理出《漫谈义和团故事的搜集整理与创作》一文，这篇论文近三万字。在《民间文学》1963 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连续发表。

张士杰在民间文学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社会上有了名气以后，没有离开龙河，没有离开乡亲，仍然扎根于家乡的泥土之中。他穿的仍是粗布衣，住的仍是土坯房。一篇篇作品的发表，一本本民间故事集的出版，使他有了相当可观的稿费收入。可是，因他从小就接受了义和团英雄的影响，除了有一颗炽热的爱国爱民的丹丹红心外，还有一副助人为乐的侠义心肠。他没有把稿费看作个人私产，除了为本村学校购买一批图书，建立起一个图书室外，还把自己的一部分稿费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援助穷困的乡亲、朋友。1963年静海县闹水灾，张士杰一下就拿出五百元稿费支援灾区；1965年邢台地震，张士杰献出了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和十件衣服支援灾区人民。张士杰在浙江有位经常通信、但一直没见过面的朋友孙其珍，当他知道孙的爱人病逝、母亲又正在患病时，立即给他寄款100元以资援助。

张士杰成为作家后，社会地位变了，收入增加了，仍是坚持勤俭治家，全家人依然过着普通农民的生活。他的爱人张瑞祥多年来在农村坚持下地劳动。

疾风劲草

张士杰在继续深入搜集整理义和团故事的同时，目光开始转向现实社会。他利用余暇写了一篇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短篇小说，就是在1964年《新港》文学月刊第十期发表的《邮递员路大》。他还准备写一部反映乡村教师生活的中篇小说，哪知道正当这位民间文学作家文思泉涌的黄金时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象黑风一样卷到了他的面前。

1966年春天，当时驻董常甫的四清工作队对张士杰家进

行了一次查抄。这次查抄，除了抄走了他满满一屋子藏书外，还抄走了他十二个厚厚的笔记本，这十二个笔记本是他十多年来搜集民间文学的记录，其中大部分是义和团斗争史料，这都是那些亲自参加过义和团斗争的老人一点一滴回忆着，含着热泪讲述的历史事实，是他含着热泪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张士杰正准备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创作长篇历史小说《义和团演义》紧接着由于周扬同志在一次会上曾提及义和团故事的成就张士杰因此被打成了“黑线人物”后来天津市文联和一些文艺出版社相继被砸烂了，许多文艺刊物陆续停刊了。他每月的生活补助和经济来源断了。张士杰被迫放下了他那支心爱的笔。张士杰的眼在流泪，心在滴血他是多么痛心啊！他质问头上的苍天脚下的大地我搜集整理义和团故事和史料，歌颂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到底有什么罪？难道说在这个世界上黑白真的要颠倒吗？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张士杰穷困潦倒，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困难。正如他在给老朋友周艾文的信中所写的：“这两年多来我除了贫病交加外，仍是原先那个样子靠我爱人一个妇女劳力包养五个小孩，生活非常困难，尽管我们这里这两年景都是大丰收的。如今我家已是队里的头等困难户，欠队里八百元的债，借私人的还不算。吃粮比一般的困难户还要少三分之一家里能卖的东西差不多都卖了，我14岁的大女孩她今年退学了，已参加劳动。多挣一点，也许能多吃一口，本来孩子正是上学的时候，她非要退学，弄得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个人仍然是吃商品粮，治病等其它方面不说，只是每月买口粮都是现筹措和变卖家物，有时候筹不到钱，要等两个月才买。我的病已很严重，特别是去年入冬以来，咯血、哮喘